

浙江发展的路径演进和深刻变革

郭占恒



浙江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呈现出由先发优势到科学发展新优势的路径演进，由小我浙江到大我浙江的历史性变革

改革开放以来，浙江以“干在实处、走在前列、勇立潮头、敢于担当”的精神，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文明、党的建设、政府治理等多方面，发挥了改革开放发展的试验田、示范田、高产田作用，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浙江样本。其中，最为重要的是，在“八八战略”指引下，浙江成功摆脱传统路径依赖，走上了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大道，创造了转型发展的奇迹。

回顾浙江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，如果从大的历史观和宏观层面看，可划分两大阶段，呈现出由先发优势到科学发展新优势的路径演进，由小我浙江到大我浙江的历史性变革。

第一大阶段，即 1978 年至 2002 年，主要特点体现在自发、民营、经济、允许这四个关键词上，形成浙江发展的先发优势

改革开放初期，浙江发展的起点并不高，存在“三缺少”：一是缺少陆域自然资源，人均耕地只有0.5亩，缺少少煤无油，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居全国倒数第三位。二是缺少国家资金投入，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间，国家对浙江的投资总计77亿元，人均410元，只占全国的1.5%，还不到当时全国各省区平均水平的一半。“一五”时期国家兴建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，浙江一个没有，后来国家对浙江的投资也很少。三是缺少优惠政策，没有享受到国家区域指向性的政策，如创办经济特区、浦东开放开发、西部大开发、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等区域政策，浙江都不沾边，可以说没有吃偏饭。

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，浙江抓住改革开放的大机遇，闯出一条富有生机活力的特色发展道路，实现了追赶型、跨越式的发展。经济总量由全国第12位跃升到第四位，人均GDP由第16位跃升到第五位，2017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连续17年位居全国各省（区）第一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连续33年位居全国各省（区）第一，创造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浙江模式。这一模式不同于以深圳模式为代表的广东模式，也不同于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江苏模式，其主要内涵特点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。

其一，自发的，自下而上的，率先从山区海岛等贫困地区发起。古人云：穷则思变，变则通，通则达。浙江改革开放的动力，主要来自老百姓强烈的致富欲望，而且越是穷的地方，越是落后的地方，胆子越大，办法越多，创造力越强。如领取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温州人章华妹，第一个敢同县委书记吵架要求开放城乡市场的义乌人冯爱倩，第一个农民造汽车的台州人李书福，创建全国第一个专业市场的温州永嘉县桥头镇，创建第一个农民城的温州苍南县龙港镇，以及丽水山区崛起的全国洗涤行业龙头企业纳爱斯等。这些来自山区海岛等基层的老百姓，创造弘扬“四千精神”“三板精神”，走出山村，走出海岛，走向全国，走向世界，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。

其二，民营企业异军突起，由散兵游勇发展壮大为主力军。改革开放初期，浙江还是农业为主的省份，国有企业数量不多，乡镇企业不发达，计划经济的控制力相对较弱，体制外的成长空间比较大，这为浙江率先冲破僵化的体制和机制束缚，率先培育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主体和制度框架，创造了有利条件。自上世纪70年代末，个体私营等民营企业，率先从温州、台州等地兴起蔓延，如同雨后春笋，蓬勃成长，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从弱到强，从少到多，渐成燎原之势，成为浙江改革开放的主体，成为工业化、城市化、市场化、国际化的主力军，成为吸纳就业、上缴税收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最大来源，成为推动全省经济发展的最大力量。可以说，没有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，就不会有浙江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辉煌成就，就不会有浙江经济的勃勃生机和强劲活力，当然也就不会有今天全国民营经济占据“五六七八九”的大好形势。

其三，偏重于经济发展，走出一条以小博大的特色发展路子。浙江发展初期的典型特征是“小”：一是小资本，许多企业在发展初期原始投入都很小，有的注册资本只有几千元，如万向集团靠4000元起家。二是小企业，父子、兄弟、夫妻和亲戚、朋友齐上阵，大家集资办厂，形成家族制企业，然后再逐渐扩大生产规模，目前小企业仍占全省企业的99%。三是小商品，由于小商品生产的资金、技术、人才等门槛低，适于小资本和小企业生产，所以大多选择鞋子、袜子、领带、服装等轻纺产品，即使搞一点大工业，也是从零部件和小型设备做起，如汽车先搞零部件、电气设备先搞低压电器等。四是小城镇，浙江的工业化是从农村起步的，创业者主要是洗脚上田的农民，这包括鲁冠球、李书福、徐冠巨、南存辉等，当时的企业只能是村办企业办在村、乡办企业办在乡，依托小城镇而发展。如何以小博大，弥补小的先天不足，浙江实行无中生有和人有我优、人优我强的发展思路，以民营企业为主体，以专业市场为渠道，以块状产业为基地，以小城镇建设为依托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、小产业大集中、小资本大集聚、小城镇大建设的发展优势，成功走出一条“轻、小、民、加、特”的快速工业化道路。

第四，允许先行先试，为基层和企业发展营造宽松环境。当时的政府作用，主要不是体现在政策“引

导”上，而是体现在政策“允许”上，政府的高明就是相信基层和老百姓的聪明，可以先上车再补票，先发展再规范，先生孩子再起名，为基层和老百姓的创业创新闯天下提供宽松的环境。如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形成，就是当时的县委书记谢高华听取了群众意见，领导义乌县委、县政府于 1982 年出台文件提出“四个允许”放出来的，即“允许农民弃农经商，允许农民长途贩运，允许开放城乡市场，允许多渠道竞争”。后来时任省委书记李泽民总结提出“三个允许五个不”的工作思路，即允许试、允许闯甚至允许犯错误；不争论、不攀比、不张扬、不气馁、不动摇；坚定、清醒、有作为。这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基层和群众的创造活力。这里，表面看是无为而治，实际也是一种担当和作为，体现在对一时看不准的，当时的政策环境不允许而广大老百姓又愿意干的事，则按照邓小平提出的“允许看，但要坚决地试”的要求，放手让群众去干。后来浙江形成的诸多第一，大多是政府允许和放出来的，是充分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的结果。



第二大阶段，2003 年至今，主要特点体现在自觉、多元、全面、引领这四个关键词上，形成浙江科学发展新优势

进入 21 世纪的浙江，世情、国情、省情发生了深刻变化，如同省委所清醒判断的：浙江发展“进入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”，遇到了“成长的烦恼”和发展中的问题。这时的浙江，不仅面临“正在生产的缺电，正在建设的缺钱，正在招商的缺地”等“三缺”问题，更重要的是，前 20 多年快速发展累积起来的矛盾和问题集中暴露出来。主要包括：经济结构“低、小、散、乱”的先天不足，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严重滞后，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过大，城市化水平不高和“城市病”显现，农村环境“脏乱差”和“空心村”，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环境恶化，社会矛盾问题频发，领导干部面临本领恐慌等，亟待探索新的发展思路和路径，引领浙江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变提升。在此关键时刻，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，领导省委谋划、提出、实施“八八战略”，引领和推动浙江成功实现了这一历史性的大转变。这一阶段的主要内涵特点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。

其一，自觉的，上下互动的，以“八八战略”为顶层设计和引领。浙江发展起来以后面临的问题，大多涉及全面性、公共性、协调性、长远性等问题，如提高经济结构和综合竞争力、发展科教文卫事业、建设水电气路桥等设施、综合治理生态环境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、推进民主法治建设、提升党政干部眼界和水平等。这都不是简单允许基层和企业创新所能解决的，而必须要有顶层设计，进行超前思考、系统谋划和战略布局。有鉴于此，习近平经过大量调查研究，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，认真分析世情、国情、省情的深刻变化，把中央精神与浙江实际紧密结合起来，提出“进一步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、实施八个方面的举措”的“八八战略”，擘画了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宏伟蓝图，引领浙江由自发走上自觉的发展轨道。

其二，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主体共同发力。一个经济体的生机活力，一定是存在多元主体而且充分竞争。浙江民营经济先发以后，面临两个问题，一是如何发挥鲶鱼效应，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改组改制，激发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生机活力。二是民营企业如何改变“小、低、散”及家族制的先天不足，实现脱胎换骨、凤凰涅槃的浴火重生。针对于此，习近平明确提出“坚持‘两个毫不动摇’，推动国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，推动个私经济不断上规模、上水平”的“两坚持、两推动”要求。他多次深入国有企业调查，召开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，部署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任务。他多次深入民营企业调研，召开全省民营经济大会，推动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高和实现新飞跃。他还多次提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，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。由此使浙江形成了民企、国企、外企相得益彰，共同发展的格局。

其三，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等全面发展。由于历史的多方面原因，浙江最初偏重于经济发展，而经济发展又偏重于民营经济、块状经济、专业市场、小城镇、县域经济的发展，而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等发展相对滞后，即使经济发展也存在诸如粗制滥造、粗放经营、外部不经济等问题。自实施“八八战略”以来，浙江从深化改革、扩大开放、经济转型、统筹城乡、创建生态省、念好“山海经”、软硬环境建设、建设文化大省等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各个方面，全面谋划，全面推进，全面发力，全面提升，推动浙江走上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道路，形成浙江全面发展的新优势。在“浙”里，率先提出深入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生态文明理念“，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”荣获联合国“地球卫士”奖，跳出浙江、发展浙江再造了“三个浙江”，念好“山海经”使山区和海洋成为全省新的经济增长点，平安浙江、文化浙江、法治浙江等齐头并进、多点开花，形成“万紫千红的浙江实践”。



第四，党政科学有为，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。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，表面是企业

竞争，背后实际是政府竞争，是营商环境的竞争。早在“八八战略”提出之初，习近平就强调“：贯彻这些决策和部署，既有现实紧迫性，又是一项长期的任务，我们要咬定目标，一任接一任、一届接一届地抓下去”。他提出“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”的总体要求，狠抓“八八战略”的贯彻落实，狠抓领导干部和机关作风建设，狠抓法治建设和各项规章制度建设，要求浙江的党员干部算一算“利益账”“法纪账”“良心账”，强调“每个领导干部只有想清楚、算明白了这‘三笔账’，才能真正行使好人民赋予的权力。”进而培养打造一支信仰坚定、敢于担当、本领过硬、干净干事的“浙江铁军”。历届省委、省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、一任接着一任干，坚持一手抓经济报表，一手抓平安报表，以实施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为抓手，努力打造“审批事项最少、办事效率最高、政务环境最优、群众和企业获得感最强”的服务型政府，不断续写“八八战略”再深化、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篇章。

特别需要强调的是，在上述这两大阶段的演进中，浙江成功摆脱了经济学所说的路径依赖，提升了发展格局和品质，从偏重于经济发展的小我浙江蝶变成全面发展、大气开放的大我浙江。

路径依赖，原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，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，无论是“好”是“坏”，都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·诺斯，用“路径依赖”阐释经济制度的演进，并被奉为主臬。这说明要摆脱传统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是不容易的。

2003年以来，浙江按照“八八战略”擘画的宏伟蓝图，成功实现从偏重经济发展，经济发展又偏重“轻、小、民、加、特”发展，转向经济高质量发展，转向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全面发展，成功摆脱了传统路径依赖，创造了发展路径演进的新样本。经济上，由“低小散转向高精尖，高质量取代高增速”，即由小商品生产大省发展为船舶、汽车、飞机、装备生产大省，由传统制造业大省发展为互联网、云计算、大数据等数字经济大省，由外贸出口大省发展为深度参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大省，由陆域资源小省发展为海洋经济大省等，如同《人民日报》2017年3月19日第一版所言《浙江实体经济正质变》。政治上，积极探索省域层面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，率先建设“法治浙江”；文化上，总结弘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，加快建设“文化大省”；社会上，按照“大平安”理念，加强“平安浙江”建设，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；生态上，以“两山”理念为指引，以“千万工程”为载体，率先建设“美丽浙江”；还接连成功举办G20杭州峰会、世界互联网大会、联合国地理信息大会、世界油商大会以及即将举办亚运会，从多方面创造中国发展明天的浙江实践。